

籍贯、技术水平和性别对工人 自组织的影响

——以嘉兴服装业为例

范璐璐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嘉兴服装业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存在两种类型的工人自组织——合作生产队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合作生产队是由本地技术熟练的女工发起的互助生产组织,这种组织使得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工作自主性。包工头管理的队伍则多是由外来农民工构成,存在等级制。这两种组织在内部权力结构、组织信念以及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方面存在差异。笔者认为籍贯、技术水平、性别等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不同的工人形成了不同的自组织,获得了不同的议价能力。

关键词: 合作生产队 服装业 籍贯 技术水平 性别

一、问题提出

在讨论劳工的团结与分化问题的时候,地缘、技术水平、性别等因素常常是构成群体团结认同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些因素也被资方利用来制造工人之间的分化。就像亨利·伯恩斯坦(2011: 176)提到的那样:“(工人)并不是普遍地、明显地、全部地感受到他们是一个受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而是感受到一些特定的身份,如‘城市人或农村人、工厂工人或农业劳工、城市手工艺人和女性农民、男人或女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年轻人或老年人、黑人或白人,以及地区、民族和种族差异,如此等等’……某些资本家在他们雇佣劳动力、组织生产和对付劳工阶级的抵抗时,常常抓住这些相关的社会差异与社会分隔,如性别、年龄、地点(城镇和乡村),还有种族和民族。”虽然地缘、技术水平、性别等因素使得工人形成了分化的群体,但是在这些群体内部,工人却常常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团结,甚至结成了一些自

组织。本文所讨论的工人自组织是指工人自发形成的、有维权作用的组织，这些组织不像工会那样被正式制度认可，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备案，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和《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 1919 - 1949》等劳工社会史研究提出，地缘、技术水平和性别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不同的工人形成了不同的自组织，并且对劳工政治产生影响。比如裴宜理的研究发现，来自中国不同地域的工人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组织形式，以及来自前工业社会的风俗习惯，这使得不同地域的工人出现了行业、工作职位和技能上的分化。工人在籍贯上的分化也在分裂和团结两方面影响了劳工的抗争性政治：来自南方的技术工人组织形成较民主的行会，针对增长型的诉求开展集体行动；来自北方的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则受包工头和帮派控制。在 1839 年至 1949 年的上海，包工头把持了很多半技术、非技术岗位的工作机会，他们从乡村招募工人并监督工人的表现。工人对包工头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帮派中都要听命于包工头，罢工行动也多是在包工头和帮派首领的授意下进行或终止（Perry, 1993）。地缘政治对产业政治、工人组织的影响之深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劳工运动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Perry, 1993）。1949 年之前的上海，也有基于性别认同的女工自组织，比如姐妹会可以在女工面临解雇、被欺压危险的时候保护女工。但是像姐妹会这样基于性别和地缘团结的组织也会遭遇一些限制——“男女分开、地域关系、同过房娘和帮会的联系——所有这些削弱了阶级团结，也可能限制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姐妹会来开展组织活动。”（洪尼格，2011：206）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由于工会主要是基于工作场所成立的，并且高度依赖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农民工，尤其是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维权时很难获得工会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工者协会”、“同乡会”、“劳权会”等工人自组织就涌现出来了。这些组织有效地衔接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通过同乡这种地缘关系拉近彼此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从而更易于建立认同，团结工人进行集体维权（陈建胜、刘志军，2010）。也有学者关注帮派团体在工人维权中的作用，比如工厂内迁使得内地的农民失去土地，只能进厂打工依靠工资为生。由于在工厂内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使得年轻工人与天然的地方性社群网络相结合，形成帮派团体、混混团伙，以暴力形式对抗他们不满的管理层（汪建华等，2015；汪建华，2015）。对中国现在工人自组织的研究注意到了地缘因素的影响，但是技术水平、性别如何影响了工人自组织在当代的劳工研究中却鲜有涉及。本文所研究的服装业

是广泛采取非正规用工的产业,已有的对于中国服装产业工人维权的研究发现工人很依赖地缘网络寻找工作和进行维权(Gao, 2006; Liu, 2011; 黄岩, 2012),与服装业相类似的广泛采取非正规用工的建筑业的工人维权同样采取这样的形式,依靠地缘的网络追讨工资(潘毅等, 2010)和进行职业病维权(范璐璐、吴子峰, 2016)。服装业同时也是一个女性主导的产业,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在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服装业女性工人所占的比例一直是高于65%的。工人基于地缘、性别、技术的因素会形成怎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对于工人的维权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探究,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于当代中国劳工政治的影响因素的认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预调查阶段,主要采取访谈的研究方法。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之间,笔者参与的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中印劳工状况与工作贫穷问题”课题组(以下简称为“ESRC工作贫穷研究课题组”)^①选取了长三角地区四个城市做服装业生产和工人状况的调研,这4个城市分别是嘉兴、上海、杭州和湖州。这一阶段的调研涉及30个服装厂和9个非工厂的生产单位。^②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使用访谈提纲对企业的管理者和非工厂生产单位的所有者进行访谈。

第二个阶段为问卷调查阶段。2013年1月,ESRC工作贫穷研究课题组在嘉兴和上海进行了关于工厂工人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和工会作用等情况的问卷调查,收集了121份工厂工人的问卷。其中嘉兴工人占88.4%,上海工人占11.6%。由于服装业的很多生产单位规模小、地点分散、没有经过合法注册,工会很难组织这部分非正规就业的工人。即便是在注册的服装厂,工人的入会率也很低,工会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③

① 由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中印劳工状况与工作贫穷问题“Labour Conditions and the Working Poor in China and India”, supported by the ESRC-DFID Joint Fun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grant number ES/I033599/1)。

② 非工厂生产单位是指没有注册为企业,不需要纳税的生产单位。

③ 比如在这项问卷调查中只有26.4%的工人明确知道自己是工会会员。在“工会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中,占比例最高的三大回答分别是“发放节日福利”(22.3%)、“没有用”(18.2%)和“不知道”(14%)。由于调研主要是在大中型工厂进行的,在小型工厂的工会入会率可能会更低。

但与此同时，合作生产队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这两种工人的自组织却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会发挥了一定作用，所以下一阶段的研究着重考察两种工人自组织的特点和作用。

第三个阶段为参与式观察阶段。在 2013 年 3 月到 8 月间，笔者在嘉兴平湖的两个服装厂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且对两个工厂上下游产业链的情况以及湖州和杭州的作坊进行研究。这段时间的研究涉及 15 个生产单位和 640 名左右的工人，在田野笔记中有访谈记录的工人和管理者有 100 余人。2014 年 1 月，笔者又对嘉兴的服装工人进行回访，了解他们全年的生产情况。

三、研究发现：服装业工人自组织形态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在长三角服装厂中存在四种类型的工人，分别是没有加入任何自组织的独立的长期工、由包工头招募并管理的工人、合作生产队的工人以及单个的外包工（见表 1）。

表 1 长三角服装业工人类型

	嘉兴	上海	杭州	湖州
访谈工厂的类型	出口加工企业	大型生产企业	为电子商务加工服装的工厂	童装厂
工人类型	合作生产队的工人 独立的长期工 包工头管理的工人 单个的外包工	独立的长期工 包工头管理的工人 单个的外包工	独立的长期工 包工头管理的工人 单个的外包工	独立的长期工 包工头管理的工人 单个的外包工

其中合作生产队的工人是嘉兴独有的，也是本文所重点考察的工人自组织类型。这种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工人自组织的形式是在本地农民逐渐失去生产资料、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以及“用工荒”的背景下出现的。合作生产队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在内部权力结构、组织信念、维权目标和行动策略方面都有所不同，这是由于两种组织的工人在籍贯、技术水平、性别方面的不同造成的。

(一) 嘉兴服装产业链与工人类型

合作生产队是指从 2006 年左右开始在嘉兴出现的一种服装工人自组织类型。一

些熟练技术工人在家中组织生产，从附近工厂中接单子，在生产中协同合作，并且平分工资。当缺乏足够的外发订单时，他们也集体进入工厂中承包一个流水线来完成订单，并且自己排定流水、组织生产、平分加工费。工厂中通常称这些工人为“包单子的”或者“包流水的”。这种服装工人自由结成的平等、互助的生产组织有一些特点类似于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生产合作社（producers' cooperative）^①，但是缺乏明确的会员资格以及成文的章程和组织结构，而且彼此之间没有联结，所以本文用“合作生产队”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类生产组织。“单个的外包工”在工厂中通常被称为“插忙工”，指一些技术熟练工不愿意成为长期正式工，而更愿意以计件或者日薪的方式成为临时工人。通常来说，这些工人的计件工资或者日薪要高于长期工，他们不像合作生产队的工人那样有组织性，而是单独和资方议价。这些工人可以随时选择离开，因为他们的工资通常是日结的，不像部分长期工那样被雇主扣压一个到两个月的工资。

本研究以嘉兴平湖为主要田野点，考察工厂中各种类型的工人的状况。2013年，嘉兴477家规模以上服装企业完成产值385.2亿元（嘉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4：86）。嘉兴平湖被誉为“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城”，至2011年末，全市共有服装企业1400多家，从业人员12.36万余人，年产各类服装3亿件（套），服装及衣着附件完成出口实绩11.98亿美元（陈仕栋，2012）。

基于以上三个阶段对于嘉兴平湖服装业的研究发现，笔者绘制了服装制造业的产业链图（见图1），箭头指向的是订单发包的方向。由图可知，合作生产队广泛存在于各类生产单位中。

图1所示的工厂中的四类工人——单独的长期工、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合作生产队的工人以及单独的外包工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平、籍贯、性别和年龄特点，他们在工资水平、支付工资方式以及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方面也存在差异（见表2）。

在技术水平方面，合作生产队的工人都是全能熟练工，熟悉服装车缝工艺的整个流程，可以独立完成一件服装的生产。单独的外包工是熟练工，有一些熟悉车缝工艺的各个流程，也有一些是负责包装的工人，所以不全是全能熟练工。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和单独的长期工中既包括了熟练工又包括了非熟练工。

^① 国际劳工组织所定义的生产合作社是生产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自由结成、民主管理的生产单位。一般来说这些单位具有比较明确的资格、成文的章程和组织结构，有一些生产合作社之间还有联合（ILO，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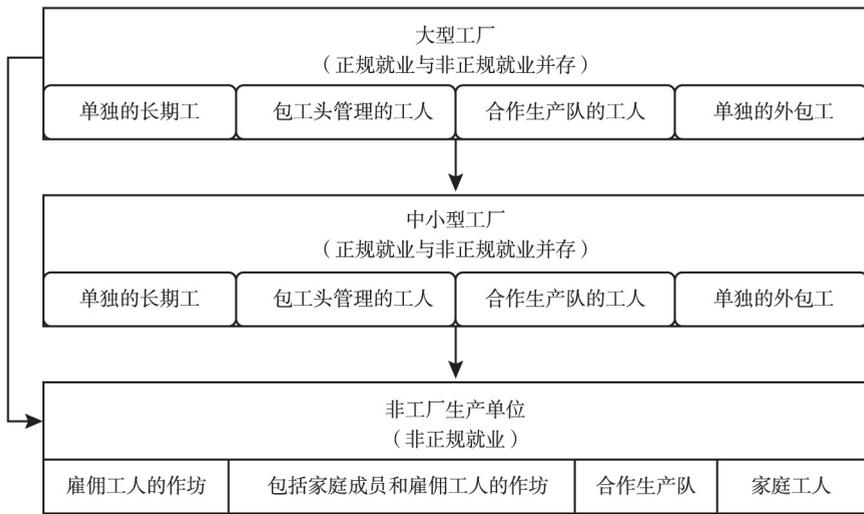


图 1 嘉兴服装业的生产组织和工人类型^①

资料来源：笔者的田野调查。

表 2 四种工厂工人的差异

	技术水平	籍贯	性别和年龄	平均小时工资	劳动过程控制
合作生产队的工人	全能熟练工	本地工人为主	本地中年女工为主	11.6 - 15.4 元	不需要遵守厂规厂纪
单独的外包工	熟练工	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	中青年工人	11.5 - 15.3 元	要遵守厂规厂纪
包工头管理的工人	熟练工和非熟练工	大多是外地工人	中青年工人以及童工	5.4 - 13.3 元	要接受工厂和包工头的双重管理
单独的长期工	熟练工和非熟练工	大多是外地工人	年轻工人	5.3 - 11.8 元	要遵守厂规厂纪

资料来源：笔者的田野调查。

在工人的籍贯方面，合作生产队的工人以嘉兴平湖本地工人为主，单独的外包工中有本地工人，也有外地工人。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和单独的长期工多是外地工人。

在工人的性别和年龄方面，合作生产队的工人主要为本地中年女工，有多年的服装生产的经验。单独的外包工中有男性也有女性，以中青年工人为主，包工头管理的工人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有时会有童工。单独的长期工多是年轻工人，有些刚

① 箭头代表服装订单发包的流向。

进入服装业不久。

按照各类工人描述的工资金额和工作时间，笔者计算了各类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由于淡季和旺季的计件单价差距明显，笔者分别计算了淡季和旺季的平均小时工资和群体内部各个工人的工资差距。合作生产队的工人和单独的外包工的工资水平最高，且群体内部差距不大。而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和单独的长期工的群体内部工资差距很大，这与群体内既包括技术熟练工，又包括非熟练工有关。除此之外，在支付工资的方法上也可以看到合作生产队的工人和单独的外包工相对于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和单独的长期工的优势。合作生产队的工人在订单完成后的 20 天内会收到工资，单独的外包工的工资是每天支付，或者等订单完成后立即支付。而有一些厂的雇主会扣住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和单独长期工两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其余的工资有些厂会按月发放，有些厂每个月只发 1000 元左右的生活费，其余到年底再发放。这增加了工人在年底拿不到全额工资的风险，又增加了工人自主离职时的难度，因为自主离职的话工资押金就有可能拿不到。

在劳动过程控制方面，合作生产队的工人对劳动过程有更高的自主性，她们不会被工厂管理人员调动到其他工作岗位，她们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不用遵守不能迟到、早退、在工作时不能听歌、聊天等工厂纪律。单独的外包工和单独的长期工都要遵守厂规厂纪。而包工头管理的工人不仅要遵守厂规厂纪，还要接受包工头的监督和管理，在劳动过程中更缺乏自主性。

以上的对比说明合作生产队的工人在获得物质利益（Wright, 2000）和劳动过程自主性（Smith, 2006）这两个劳工力量的面向上都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这不仅是由工人的技术水平高这一结构性力量决定的，也和合作生产队这种工人的自组织赋予工人组织性力量有关。在下一节，笔者将论述合作生产队这种独特的工人自组织出现的原因及其如何赋予工人更强的组织性力量。

（二）合作生产队的出现 “两分两换” 政策与用工荒

合作生产队是由嘉兴本地已婚中年女工在 2006 年左右开始组建的生产组织。这些工人本来是农民，但是“两分两换”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家里的土地被逐渐收走，她们就长期以做服装工人为生。因此，尽管许多人户籍还在农村，但是她们的身份认同更接近于工人。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推动了城市周边区域农地资源尤其是耕地

资源的非农转化。嘉兴市的“两分两换”政策旨在通过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在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做法，实现“土地节约集约有增量，农民安居乐业有保障”的目标^①。已有研究发现“两分两换”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不顾实施条件与政策对象，盲目推进；没有坚持自愿原则，没有引入农户对政策过程的全程参与机制；没有处理好政策配套工作，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等（李通，2010）。这一政策使得很多本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转而依靠工资收入为生。有两个指标证明本地农民相对于一般农民工更加依赖于工资收入。一是工资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在2003年至2013年之间，嘉兴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一直高于浙江和全国水平（见图2）。2014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75.6%（叶永强，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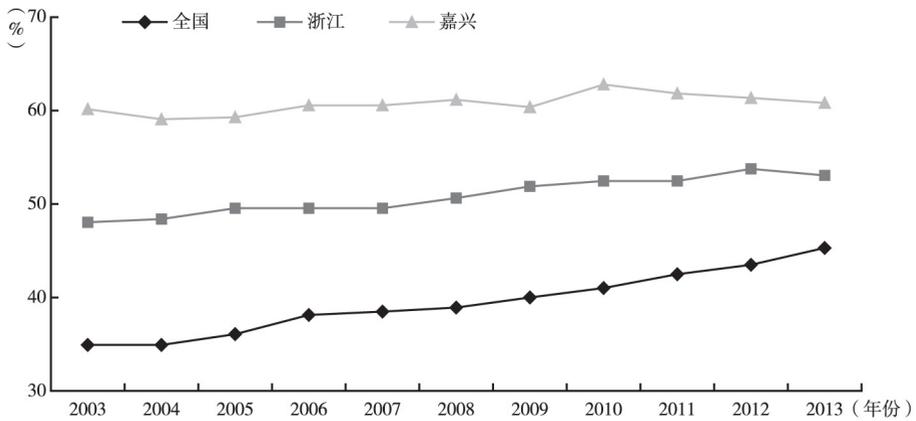


图2 工资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

资料来源：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2014）、《浙江年鉴》（2004-2014）和《嘉兴年鉴》（2004-2014）整理。

二是土地流转的比例，嘉兴也是高于浙江和全国的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国耕地流转的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4%，这一数据在浙江是48%，且浙江的土地流转大部分没有用于种植粮食作物，也很少流转进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部经管总站体系与信息处，2015）。而截至2014年11月底，在嘉兴平湖市87个

① 引自《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使用制度，推进“两分两换”工作的通知》（嘉委发〔2009〕38号）。

村中，实现整村流转的就达到了 11 个（李小平，2014）。

在嘉兴，土地流转并没有导向黄宗智（2010）所讨论的家庭农场模式或农会模式。黄宗智认为家庭农场适宜的规模是 7 亩到 15 亩，但密集化的家庭农场生产和农民协会并未在当下的中国实现。笔者认为有两大因素造成了这一结果：一是大资本集约化经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值，地方政府也乐于促成大的经营主体的出现，以从中获得更多利税；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收入相对于农业来说更高，使得农民倾向于离开农业生产。现存的很多合作社徒有虚名，许多是资本化经营的农场。比如平湖政府的《平湖农民喜领土地流转“分红”》^①的报道一文中写道：

王杏观是新埭镇姚浜村 13 组的村民，一直想要发展规模农业。“可是农村土地分散不好管理，很难实现规模经营。”王杏观说，2009 年底，他抓住土地流转的有利契机，承包了面积 1600 亩的土地，成立了平湖市三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种植水稻、芦笋、生姜等作物，实现了规模经营。

文中提到平湖市最大规模的行政村鱼圻塘村在 2012 年基本实现土地整村流转后，全村面积 8700 多亩的土地引进了 66 户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 16 户，其中土地承包面积最多的达到 2200 亩，最少的也有数十亩。平湖鱼圻塘村党委书记张勤良在这篇报道中谈了土地流转的一个后果“土地流转后，经营主体发生了变化，同时释放了大量劳动力，更多的农民进厂务工赚工资。”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访谈到的很多本地工人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土地或者被农业种植大户流转走，或者由政府收走用于农业之外的用途。失去农地后的农民只能进厂打工，依靠工资生活，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服装业是嘉兴平湖的重要产业，吸纳了很多本地农村户籍的人口就业。有一些本地农民工家里还有可耕种的土地，但是规模非常小。根据笔者在服装厂对本地工人的访谈，按照平湖当地的平均水平，一个农村的三口之家在土地没有被征走之前一般有三亩左右的承包田，他们通常种植水稻来满足自己的口粮需求。除去口粮，真正进入流通领域的非常少，大约只有 1000 斤的稻谷可以用来卖，市场价值大约是 1400 元人民币^②。在

① 谢付良，《平湖农民喜领土地流转“分红”》，引自《嘉兴日报》。网址：<http://ph2009.zjol.com.cn/phnews/system/2014/12/24/018848901.shtml>。

② 资料来源：2013 年 6 月 17 日田野笔记。

2013年时，这大约只相当于服装业一个熟练车工年工资的3%。因此，小型的家户农业生产并不能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实际上这在家庭纯收入中占有非常小的比例。

自从2006年开始，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变得日益严重，在服装业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嘉兴人才市场的报告显示，2007年，对于裁剪和车缝工人的需求是34657人，却只有10156个工人求职此类的岗位，求人倍率是3.41^①。到本研究所做调查的2013年，服装业工人的求人倍率是2.45，求职者中53.18%是男工^②，而本地技术熟练的女工则有了更强的市场议价能力和自主性来选择工作场所。由于她们不像单独外出务工的女性农民工那样可以暂时摆脱家务劳动，传统的性别分工认为她们对家庭事务负有更多的责任，在服装业这样工作时间超长的产业中，她们也面临着更多“工作—生活”失衡的问题。为了有更强的自主性来兼顾家务琐事，一些技术熟练的本地已婚女工组织了合作生产队来逃避工厂严苛的管理制度。她们有时在厂外、团队成员的家中接单子生产，有时一起进入工厂中包单子^③。即使在工厂中生产，她们也可以自己控制劳动时间和劳动过程，不必接受工厂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调遣。由于成员都是全能熟练工，一个单子加工完以后，所有的成员会平分工资，团队中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而不是像包工头管理的队伍那样存在等级制。由于不存在包工头来模糊劳资之间的矛盾，合作生产队的工人明确地认识到她们的利益是和资方对立的。在2013年，当生产一个订单的计件单价折算的小时工资在淡季少于13元，在旺季少于16元^④，她们就会集体和工厂主或者其他发包人协商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价。如果对方不肯让步，她们会以集体停工来争取一个合理的工价，这在工期紧的时候尤为有效。合作生产队使得工人获得了组织性的力量来和资方议价，在用工荒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本地熟练男工、外地的熟练工也开始加入或者组织合作生产队。

嘉兴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高于全国和浙江的水平，但是土地流转并没有导向家

① 《嘉兴2007年度劳动力市场报告昨发布》，引自中华纺织网。网址：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08-3-26/136358_1.html。

② 《嘉兴市2013年上半年企业用工和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告》，引自嘉兴就业网。网址：<http://www.jxjiuye.com/Article/display.asp?ID=3259>。

③ 合作生产队的成员有时会承接一个单子而进入工厂，生产队的成员共同完成全部的缝纫流程。如果她们对计件单价和厂方的其他待遇（如工作环境、伙食等）也满意，可能就在此工厂工作一段时间。

④ 这一工资水平即便减去自己要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还是高于工厂中的普通的长期工。

庭农场或者农会模式，而是集中在了少数进行规模经营的人手中或者被转做非农用途。这使得很多本地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工资生活，服装业是本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很多本地的失地农民成为了服装业的稳定劳动力，并形成了彼此熟悉的工人网络。服装产业的用工荒对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的需求缺口较大，使得本地的熟练技术工人有更强的市场议价能力和选择工作场所的自主性，她们组成了合作生产队来获得组织性的议价能力，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强的工作自主性。

(三) 服装业工人的自组织：籍贯、技术水平与性别

通过对嘉兴服装业的研究，笔者发现工人的生产自组织主要有合作生产队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两种形式。两种组织在内部权力结构、组织信念、维权目标和行动策略方面各有不同，并且籍贯、技术水平、性别的因素使得不同的工人倾向加入或者组成不同的组织（见表3）。

表3 嘉兴服装业两类工人自组织的特点

	合作生产队	包工头管理的队伍
籍贯	以本地人为主	主要为外来工
技术水平	全能熟练工	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
内部的权力结构	平等、互助的关系	等级制
关于工资的观念	必须有合理的计件单价	多劳多得
集体行动的特点	阶级取向的，进取型的目标	被包工头或帮派首领控制的，防御型的目标

资料来源：笔者的田野调查。

这两种工人的生产组织在内部权力结构上存在差异。合作生产队的工人都是全能熟练技术工人，而且在初期基本都是由女工组成的，成员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工人自己组织生产，之后平均分配加工费。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则是等级制的，在包工头和普通工人、年老一辈和年青一辈工人，以及熟练工和新手之间存在等级制。包工头在劳资之间具有双重的角色，通常只有当工人在一个工厂干满一定时间（比如有些工厂规定是6个月），他/她的包工头才能拿到企业的介绍费，所以包工头会努力劝说工人服从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从而可以在工厂中长期工作。同时，为了确保工人接受包工头的管理，有时包工头也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协商。

在组织信念和集体行动方面，合作生产队的成员不接受模糊的工资计算体系，而是坚持要有一个明确、合理的、根据工作所花时间所确定的计件单价。她们一般只有口头的约定而不是书面的合同。对于合作已久的人，她们有一定的信任感，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再收加工费。然而，对于不熟悉的人，她们只有在收到加工费全款的时候才会交出产品。如果在计件单价的基础上的日薪少于一定数目的时候（比如13.5小时的工作，在淡季一天170元，旺季一天220元^①），她们就会扣留着产品和原材料来争取一个更合理的计价单价。这种行动常常可以达到目的，尤其是在旺季、发包方急着发货的时候。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包工头的工资需要依靠工人对工厂纪律的服从和工人的产出，所以包工头会灌输给工人“多劳多得”的观念，不让工人关注计件单价，而是说老板会根据工人的表现来给付相应的工资的。但是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平时每个月只会发一千元左右的生活费，只有到年底结清工资的时候才会知道每个月的工资有多少，这个时候，就算工人觉得工资不合理，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机会。这样的工资制度和组织信条会削弱工人在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从而创造更多机会让资本剥削工人。并且与合作生产队希望提高计件单价这样进取型的原因导致的集体行动不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多是由于防御型的原因采取集体行动，比如到年底工资还没有结清，或者工人被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人欺负。比如笔者观察到的一个个案，一个来自安徽的工人车缝衣服时出现问题，这导致了下一个工序的山东工人也要返工。由于工期紧，每天的工作任务重，这两个来自不同包工头队伍的工人因为这件事而吵了起来，甚至出现了肢体冲突，进而引发了两个队伍的对峙。两方的工人都在包工头的授意下以停工表达不满，要求资方辞退对方的工人，甚至叫来了己方的地域性帮派来威胁对方。由于合作生产队的工人自己完成订单，自己控制劳动过程，不会出现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在工作场所出现矛盾的情况。合作生产队的工人的集体行动也都是针对资方的，不会针对其他地域的工人。

两种组织的不同和它们各自构成的基础有关，也就是不同的工人构成了不同的组织。合作生产队是籍贯、技术水平、性别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相交织产生的。由于毗邻上海，改革开放后，嘉兴承接了上海服装厂外发的订单，很多本地的农民一直

① 基于笔者对参与式观察的两个厂的5个合作生产队工人的访谈得出的工价标准，并且在对工厂外的3个合作生产队工人的访谈中得到确认。

在服装业中工作。嘉兴本地农村家庭原本承包的土地就很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地。在“两分两换”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许多当地农户的土地被逐渐收走，很多人成为必须依靠工资生活的产业工人。由于长期在服装业中工作，他们对服装业中劳资对立的生产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相比于外来农民工，合作生产队工人的身份认同更接近于产业工人。服装业一直是女性劳动力主导的产业，在嘉兴也是一样。在嘉兴，本地男性多是被鼓励创业自己做老板，即便是留在服装业，也多从事机修工、裁剪师傅等技术工种，而女性则被认为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而寻求稳定工作，大多一直留在车工岗位。长期在服装业的工作经验使得她们技术全面，做服装质量高且速度快，是服装业紧缺的工人。由于很多全能熟练工是女工，长期共同工作的经历使得她们形成了基于对彼此工作能力和品行认同的网络，成员互相以“小姐妹”相称。自从2006年开始，长三角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变得日益严峻，这些熟练工组成了合作生产队来逃避工厂严苛的管理制度。合作生产队主要基于本地工人多年在服装业中工作所形成的工友网络，在招募新成员的时候工作能力比亲缘或朋友关系更为重要。她们有时在一个成员的家中进行生产，有时也一起进入工厂包单子生产。合作生产队中的准则是平等和互惠，在生产中她们互相帮助，并不存在竞争关系。通过这种组织，工人可以和工厂主或者其他发包人进行非正式的集体谈判^①，相对于单个工人的议价能力大大提高。

与合作生产队不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则多是由外来农民工组成的^②，由于包工头多是从老家招募工人，这一组织主要基于地缘和亲缘的网络形成。比如，在笔者做参与式观察的一个嘉兴的88人的小厂中，有一位山东的包工头带了20余名自己的老乡在这个厂中工作。包工头管理的队伍中有技术工人，也有非技术工人，在工人的性别比例上也不像合作生产队那样以女工为主。由于包工头管理的队伍是以包工头为核心的，而包工头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希望从雇主那里拿到更多的管理费，所以包工头会规训工人遵守工厂的制度、监督工人有更多的产出，这会压抑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但是为了能让工人留在自己管理的队伍中，包工头有时也会带领工人维权，工人是否采取集体行动主要是要看包工头的指令，其集体行动常常带有暴力倾向，并且和地方帮派有联系，男性工人在暴力行动中起到主导作用。

① 这种谈判不像工会参与的谈判那样正规，主要是就工资、工作条件等问题进行谈判。

② 据笔者2013年3月—8月对嘉兴五个包工头管理的队伍的工人的访谈。

四、结论与讨论

笔者认同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的经典论断：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地缘、技术水平和性别政治在团结和分裂的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中国的劳工政治。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当下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在一些地方，本地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完全转换成产业工人，他们和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自我认同、组织模式和集体行动模式。嘉兴实行的“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商品房”的政策使得很多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资料，必须依靠工资为生。服装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由于长期在服装业中就业，本地工人对服装业中劳资对立的生产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发动的集体行动都是针对资方的，而不是像包工头管理的队伍中的工人那样会因为工作场所积累的矛盾而与其他籍贯的工人产生冲突。本地工人的生产与再生产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完成的，所以工人会要求能够保证在本地实现稳定生活的工资。而外来农民工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分离在不同地区的，这种安排使得资方可以压低他们对于生活工资的诉求（Pun & Lu, 2010）。

在嘉兴的服装业中，地缘、技术水平和性别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不同的工人各自组成了合作生产队和包工头管理的队伍这两类工人自组织。在用工荒的背景下，议价能力较高的本地技术女工组织的合作生产队，以组织性的力量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工作自主性。这种组织中的内部权力关系是平等互助的，由于平分工资，工人在组织内部不存在竞争关系。当和资方或者管理方产生利益冲突时，工人是相互团结、一致对外的。合作生产队工人的集体行动主要是围绕着工资议题，当对计件单价不满时，工人会一起向资方或者管理方要求合理的计件单价，甚至采取集体停工的形式来争取。相比于其他工人，合作生产队的工人更能以组织性的力量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并且其集体行动不像地方帮派发动的行动那样有暴力倾向。长三角地区服装业持续的用工荒以及外来务工的工人看到这种组织模式的优势，也开始加入或自发组建，使得合作生产队的成员不再局限于嘉兴本地人。当本地年轻人不愿意在工作时间长、工作重复单调的服装业工作时，合作生产队也会吸收外地的技术工人，同时其他地方的技术工人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合作生产队。在合作生产队中，工人身份的认同会超越地缘的认同，只要原有的合作生产队的成员认可了新成员的工作能力和合作精神，便不会因为新成员原有的籍贯而产生排斥。他们在生产中会团结

协作，面对资方时会为了合理的计件单价一起据理力争，拿到加工费时也会平均分配。能被吸收进合作生产队的外地工人也多是在服装业工作年份长、技术熟练而全面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夫妻双方都在嘉兴工作多年，有些生了孩子之后还把父母接过来帮助养育子女，筹划着在此地买房落户，生活方式和本地工人趋同。而在包工头管理的队伍中，地缘认同会超越阶级认同。包工头基本上只会带自己的老乡来组成这种队伍，不同地域的工人即便在工作中面对同样不合理的计件单价和工作时间安排，也不会团结起来争取，而且工作压力常常会造成不同地域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对同处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和湖州服装业进行的调研中，笔者没有发现合作生产队这种工人自组织，已有的对于珠三角地区服装工人或者非正规工人的研究很少涉及本地工人的问题，也没有谈到过合作生产队这种组织形式（Liu, 2011; 黄岩, 2012; 郑广怀等, 2015）。笔者认为这是城市化、工业化模式的地区差异造成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阶层结构重组的过程，在珠三角城市化过程中卷入的大多数本地农民成为房东、小业主或者工厂老板，他们不需要以工资为生（李培林, 2010）。即便是同为长三角地区，像笔者调研过的杭州九堡社区和湖州织里，本地村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也有多余的房子可以出租，变成房东，而不是像嘉兴“两分两换”政策背景下的农民一样失去了生产资料，必须靠工资为生。

嘉兴“两分两换”政策作为“新土改”试验得到了国土部的认可，这一路径被诸多省市效仿（种昂, 2013），这一土地政策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对于工人自组织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地研究。在如今长三角地区服装业不景气的背景下，合作生产队和包工头管理队伍两种工人自组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伯恩斯坦, 亨利, 2011, 《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汪淳玉译, 叶敬忠校,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建胜、刘志军, 2010, 《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权的思考》, 《人文杂志》第5期。
- 陈仕栋, 2012, 《平湖年鉴》, 北京: 中华书局。
- 范璐璐、吴子峰, 2016,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与农民工职业病维权的蜂巢行动主义困境——以深圳“尘肺门”为例》, 《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15·长沙) 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洪尼格, 艾米莉, 2011, 《姐妹们与陌生人: 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韩慈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黄岩, 2012, 《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黄宗智, 2010,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嘉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4, 《嘉兴年鉴》,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李培林, 2010, 《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通, 2010, 《嘉兴市“两分两换”试验的调查与评价》,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小平, 2014, 《浙江平湖新土改路径: 整村流转制度化操作》, 《证券时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29/13391359_0.shtml)。
- 农业部经管总站体系与信息处, 2015, 《2014年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情况》, 《农村经营管理》第6期。
-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2010, 《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开放时代》第5期。
- 汪建华、郑广怀、孟泉、沈原, 2015, 《在制度化与激进化之间: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 《二十一世纪》第8期。
- 汪建华, 2015, 《生活的政治: 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叶永强, 2015, 《嘉兴年鉴》,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郑广怀、孙慧、万向东, 2015, 《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国的劳动控制》,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种昂, 2013, 《嘉兴新土改试验》, 《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2013/0606/244981.shtml>)。
- Gao, C. 2006, *The Making of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Garment Producers in Suburban Guangzhou*. Hong Kong: The Ph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Measuring Informality: A Statistical Manual o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22979.pdf.
- Liu, Y. Z. 2011, *Women in Migration: An Examination of Married Women's Migration Experiences in South China's Garment Industry*. Toronto: The PhD Thesis of York University.
- Perry, E.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u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n, N. & Lu, H. L.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 *Modern China* 36 (5) .
- Smith, C. 2006, “The Double Indeterminacy of Labour's Power, Labour Effort and Labour Mobility.”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 (2) .
- Wright, E. O. 2000,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4) .

作者单位: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 吴莹

The Effects of Native Place , Skill , and Gender on Workers' Self-org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Garment Industry in Jiaying City *Fan Lulu* 41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ucidates two types of workers' self-organization—the cooperative team and the contractor-led team—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Jiaying city , Zhejiang province. The two diverge in inner power structure ,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 and labor protection. The former is a mutual help group initiated by the local skilled female workers , empowering the workers involved with higher wages and autonomy during the labor process. The latter is a hierarchical group , with migrant workers as the major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rplay of native place , skill and gender determines the pattern of workers'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reby their bargaining power.

The Influence of Land Acquisition on Farmers' Life Satisfaction and Future Confide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urvey Data

..... *Jiang Kezhong & Chen Youhua* 57

Abstract: Based 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survey data in 2010 and 2012 , taking an approach of local linear regression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 and family fixed effects model based on the kernel matching , this paper treats the land acquisition as a quasi-experiment and finds that land acquisition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farmer's life satisfaction although non-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But land acquisi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farmer's confidence about the future. Meanwhile , the farme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 including marital status , health status , whether member of CCP or the trade unions , whether treated unfairly by the government ,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farmer's life satisfaction and confidence about the future.

The Social-political Attitudes of Subjective-objective Class: A Study on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Li Sheng* 73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ive-objective class position and the sociopolitical attitude. In this framework ,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explor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SS2008 ,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of subjective-objective clas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objective class status and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compared with the objective class status ,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is mo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social experience factor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middle class. We need to focus on